
简论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影响

彭星霖¹ 潘 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抗战时期，随着内迁，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重庆固有的文化，使重庆人文精神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繁荣了抗战文化并实现了文艺大众化，重庆人文精神还具有开放、团结、民主、坚韧等特点，抗战还孕育了红岩精神，重庆的这种人文精神为后来乃至今天重庆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人文精神;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672-366X(2007)-05-0159-06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重庆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影响了重庆人文精神，打破了重庆传统的文化，使重庆人文精神具有了新的特点。目前对重庆文化研究得很多，但对重庆人文精神进行专题研究的极少，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还处于探讨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的传统人文精神

(一)关于“人文精神”的界定

对人文精神的认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研究和讨论人文精神的高潮。第一次是1923年“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中，涉及到人文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大讨论。80年代以来研究“人文精神”的文章，以1994年为分水岭，这之前的研究为数不多，1994年文章猛增，至少有67篇，以后除1997年比前一年减少了十几篇文章外，都是逐年增长。

“人文精神”一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辞海》及相关工具书中都找不到对“人文精神”的精确解释，但“人文精神”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觉中。我们这里认为“人文精神”是指由于长期自然历史地理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区域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人们具有典型区域特征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特征。

(二)重庆传统的人文精神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从一个码头发展起来的都市，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秋冬多雾，

¹收稿日期 2007-03-24

作者简介：彭星霖(1982-)女山西平遥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秋、冬、春三季日照少、多阴天，群山环绕，交通不便，以水路为主，基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多羊肠小道，上个山都要爬半天，是有名的雾都、火炉、山城。恶劣的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重庆的发展。生产主要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都相对较少，距离首都又较远，信息不灵，用人马传递信件，几乎没有其他通信工具。

重庆虽是川东重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放眼全国，它长期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的状态，在宋朝还是官员们受贬流放之地。“蜀不变服，巴不化俗”^①，经过秦汉数百年变易教化，仍不能改变巴蜀之人的服饰和习俗，可见巴蜀之地与巴蜀之人的封闭性。长期以来重庆人已经习惯了以家庭、宗族、自身利益为重，他们深居内陆，外来侵略、外部战争都很难打到重庆。人们受外来干扰少，对渝以外的整个社会、国家、全民族考虑很少、也不敏感、长此以往、重庆人形成了浓厚的盆地意识、山城意识。

重庆人历来文化素养薄弱。战前只有重庆大学和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高校，文盲居多。文化素养不高也与“湖广填四川”时迁来很多贫苦农民有关。重庆人少旧文化旧观念束缚，少儒佛礼仪而多巫风蛮气，这是由重庆历史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通孔道、居住交接地带，是盆地与山地交接地带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

重庆多战乱。古代如宋朝的张余、赵揆与赵王朝的战争；南宋末年以钓鱼城为基地与元朝的战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等。尤其到民国成立以来军阀混战是四川、重庆政局的显著特点。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中，四川开始形成新旧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兵匪交织，战火燃遍全省。1933年末“二刘之战”（刘文辉、刘湘叔侄争霸）是最大的一次，双方兵力30万。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湘统一了四川。十几年间，大小战争400多次，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局面下，重庆经济发展非常艰难。1933年统计，在上海等全国12个工业城市的工厂总数和工人总数中，重庆只占4%和3%。而且重庆以小手工业、轻纺工业为主，很少有大的企业。直到1938年刘湘病势，四川地方势力被分化，为国民党中央势力所控制，实现了“中央化”。

另外，重庆人还有浓厚的尚武倾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重庆人顽强的品格和耐劳的精神，夏天的酷热高温又使重庆人性格多火爆刚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庆人又在明清以来形成了重商的重要倾向，可以说，重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移民性的一般特征。

二、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影响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月，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次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国民党军事统帅部及主要行政机关和人员迁至重庆。同时，全国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迁，这次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生产力由东向西的大转移，重庆由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中心、由川东的一座普通城市变成一座国际名城。抗日战争打破了重庆传统的文化，给重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重庆人文精神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遭受外来侵略，就是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它对重庆人震动很大，侵犯了重庆人的切身利益，使其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使山城人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山城人认识到只有中华民族强盛，不受外来侵略，才有重庆的安宁，没有大中华就没有小重庆。原来认为重庆深居内陆，不可能遭受外来侵略已成过去，日本的飞机把重庆人炸醒了，它激发了重庆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纷纷反抗日本的侵略，这种民族意识的增强是其人文精神极其显著的特点。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重庆毅然倔强地挺立着。重庆不仅代表了国民党的声音，是正面战场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场的指挥中心，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代表了共产党的声音，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在重庆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共中央，代表了延安。重庆特殊的地位，使重庆在抗战中发挥了其他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重庆人民承担的历史责任，从地区性、局部性上升到全局性、全国性。重庆人不再也不可能闭关自守，而是肩负起为中华民族、为反法西斯而战的历史使命。人们认识到先有国，才有家，才有宗族，才有地方利益。重庆人民以把整个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气概、无私的奉献精神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重庆人民的抗战，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明确表示，“现在我们要全国一致奋起，誓死抗击日本的侵略。”^[2]国民政府不仅在大后方重庆运筹帷幄，在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指挥了无数场正面战场，如南昌会战、枣宜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还领导重庆人民在重庆本土展开了坚决的反空袭斗争，建立了自己的空军、飞虎队、高射炮兵，建立了防空洞等防空机构，还实行防空赈济。

南方局高举抗战大旗，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积极抗日，为抗战、为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由于内迁，重庆汇聚了全国大批文化精英，他们纷纷以笔为武器，鼓动广大民众抗日，并把日本的侵华罪行向全世界广而告之，使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文化人在重庆创建了许多文化文艺组织和团体，如第三厅、南方局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剧艺社、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在南方局的影响下，文化人在重庆创作和发展抗战文艺，上演抗战戏剧，放映抗战电影，演唱抗战歌曲，宣扬抗战文化。他们热血沸腾，“我们庆幸这次伟大的抗战，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现在流传在国内的戏剧同电影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那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3]他们用心宣誓，“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重庆人民的救亡运动在这悲壮慷慨的歌声鼓荡中蓬勃发展。

文化人还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罪行。文协直接把战地的消息“向国际作家宣布”^[5]。重庆电影如《中国反攻》、《东战场》、《长沙三次大捷》、《重庆一日》也先后进入美国影坛，《八百壮士》在法国、瑞士演出后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极受称赞。日本的罪行越来越为全世界人知晓，更引起日本对重庆、对文人的仇恨，对重庆实施频繁地轰炸，欲灭之而后快。

在抗战文艺的感召下，重庆人民面对日机的轰炸斗志不衰，坚持生产，支援前线，保证了前方军需和民用。1945年10月，《新华日报》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2.5万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300万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其中当然包括了重庆人民和革命者血汗的贡献；而在兵工生产、工业生产以及捐献方面，重庆则占了首位。重庆各兵工厂的广大员工“刻苦耐劳、努力生产、务期抗战资源得以供应不匮、民生需要得以取给裕如”^[6]，他们“求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之武器供应无缺，予敌重创”^[7]。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为例，如果以1941年该会开工生产时的指数为100，那么一年之后就增加到457，到1943年则高达846^[8]，极大地支援了前线。

重庆坚决抗日，影响广泛，作用巨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这给日本灭我中华之野心予以沉重打击，日本更加仇恨重庆，对重庆实施空中打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大轰炸。

（二）抗战文化的繁荣和文艺的大众化

战时可谓精英聚渝、百花争艳，重庆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时汇集大批优秀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剧作家、美术

家、音乐家和舞蹈家，他们的创作繁荣了抗战文化。

重庆上演了无数场抗战话剧，如《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东北的一角》、《凤凰城》、《小英雄》等数不胜数。《塞上风云》的主题歌第一句唱道：“起来！蒙汉族青年们！我们是朋友兄弟”，表现了各民族共同抗日的主题，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以“塞上风云”扫荡了后方的乌烟瘴气！《法西斯细菌》中的主人公、留学日本的细菌学者俞实夫，开始只研究科学不过问政治，当他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后，认识到科学与法西斯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愤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放下你的鞭子》中，当香姐被人用鞭子抽打而痛苦地倒在地上时，一青年工人愤怒地喊道：“放下你的鞭子”，“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当时话剧对日寇暴行的揭露、对军民抗战士气的鼓舞举不胜举。

上演的抗战电影有：《八百壮士》、《好丈夫》、《华北是我们的》、《孤岛天堂》、《中华儿女》、《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八百壮士》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的动人事迹编写，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好丈夫》是宣传兵役的，发动和训练农民奔赴前线抗日。

抗战小说、诗歌、历史学等也取得很大成就。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有巴金的《火》、《还魂草》，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历史研究成果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代表性的诗歌有减克家的长诗《古树的花朵》、诗集《泥土的歌》等。

另外，外国人，如英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何登夫人，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等也在渝创作抗战诗歌。被誉为“走在火焰上的女人”的绿川英子写了《失掉的两个苹果》：“我，我们/应该夺回被夺走的一切，……只有从激烈战斗的熔炉中，/我们才能把它们夺回。”这些对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救亡”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主旋律。为了发动民众抗战，必须实现文艺大众化。

早在五四时期新文艺就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走着，白话文运动是其起点，但真正使文艺“大众化”成为事实是在抗战时期。战争迫使文人走向民间，承担起发动民众抗战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文章下乡”成为一种趋势。

文人纷纷走向基层，深入民间，不仅采用民间的艺术形式，如大鼓词、楚剧等；在表达方式上也力求通俗化，采用“‘为中国老百姓所乐见喜闻’的手法与技巧”^[10]。《放下你的鞭子》搬到街头广场去演，主人公香姐又是踢腿，又是劈叉，一会儿又下腰、翻跟头，这些形式在民众看来都是很熟悉的。《火》、《还魂草》、《四世同堂》、《甲申三百年祭》等抗战文艺无不是用的白话文，通俗易懂。电影也是根据“大众的思想，环境，劳作，习俗以及社会背景”制作，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准”^[11]。《好丈夫》作为一部农村宣传影片，选取的都是描写农民的题材和适合文化水准低落的农民的导演手法。

（三）大度宽容、兼收并蓄

战时重庆不仅聚集着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潜入重庆外省人即“下江人”，而且，美、苏等 30 多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在重庆都设有使馆，有 40 多个国家在重庆建有外交关系。重庆还成立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等，有 10 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如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

据 1943 年 10 月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战时常驻在重庆的外国人员就有 1129 人。此外，各国使者来渝，世界知名人士来渝等也不计其数。这些外来人不乏精英人士，他们给重庆本土人带来了外面精彩的世界，重庆人变得思想活跃，不再局限于地方的小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容忍他人，容忍不同的意见，有什么就讲什么，显得很大度。抗战彻底打破了重庆历来的封闭性。如果说 1891 年的开埠是重庆首次被迫开放期，那么战时就是重庆的第二次被迫开放。而目前重庆正面临着第三次开放。

(四)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重庆是国共合作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国家危难中，充分表现了操心虑患、同舟共济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赴国难。虽然也有摩擦和斗争，但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破裂。南方局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民党、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中间人士。在民族危亡关头，重庆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家团结一致，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是很少见的。蒋介石也曾说过，“敌人已没有灭亡我国的力量，最怕是我们自己灭亡！”^[12]团结就是力量，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迫使日寇最终在投降协议上签字。

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工会”，团结了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如阳翰笙、沈雁冰、杜国库、沈志远、谢仁钊、田汉、洪深、剪伯赞等，起着重庆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文化工作者一致团结起来！”文坛上一扫过去分立的现象，迅速打破原有的文化派别的对立局面，组成一系列抗日文化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

普通民众也空前团结。“每次空袭后，总能看见一些人牵着失去父母的孤雏，像一头柔和的小羔羊，带回家里去爱抚。还有一些人，扶着老变慢慢地走进救济处。”“偏巷小街，电线有未及修复着，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德国友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在这里生活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战时的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日难以想象的。”日机的轰炸“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次政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细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13]重庆人民不仅搞好内部团结，还对人生地不熟的“下江人”给予帮助，让他们安心工作，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五)热切的民主主义追求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14]只有坚持民主，才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如民盟、民革中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等大都诞生于重庆。全面抗战爆发后，活跃在抗日救亡舞台上的许多民主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等纷纷迁来重庆。重庆民主力量范围很广泛。这些民主人士多数长期留学国外，他们羡慕并希望在中国也实现资产阶级式的民主。

他们不仅积极向民众鼓吹民主，还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于1939年秋、1940年9月先后两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使重庆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建设的小气候，成为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与此不无关系。

(六)愈炸愈坚、坚韧不屈

日本的轰炸使本来就顽强的重庆人越发坚韧。“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这首民谣典型地说明了重庆人愈炸愈坚的精神。“轰炸后，贫苦的人民，眼见薄薄的家私被敌人毁坏了，并不表示悲哀，反而报之以苦笑，说一声：‘有什么？重新来过！’这就是民族的精神，抗战的意志。这不是轰炸可以消灭的！”“没有哭啼，没有叫骂。……偶尔有声高叫，是服务队‘快步走’，偶尔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克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15]

金刚需要烈火来炼。重庆人民钢铁般的斗志在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经受了考验。

(七) 抗战孕育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在南方局领导的抗战中形成的。共产党不但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要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反共作斗争。“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6]

三、战时重庆人文精神对重庆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内迁打开了重庆人文的新局面，民族危亡时刻，重庆人民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熟和完善、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重庆人的思想面貌较之战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学林立，有高校十多所，中小学不计其数；重庆重工业城市格局的形成、汽车工业的雄起也得益于战时内迁的国防厂矿企业，长安、铃木、福特、嘉陵、江陵、望江等汽车厂都是当时国防工业的要害；重庆的交通四通八达，水陆空通往全国各地；与外界文化交流、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并于 2005 年 10 月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亚太市长峰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向国外招商引资。

重庆今天能够紧跟改革开放的大潮并成为第四个直辖市，与战时奠定的重庆人文基础是密不可分的。今天，重庆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建设和谐重庆，辐射大西南，打入世界，描绘重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壮丽图景。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A]. 史记[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1997: 849.

[2]前田哲男. 重庆大轰炸(中译本)[M].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30.

[3]时事新报, 1938-09-25.

[4][5]抗战文艺, 1939, (3, 4).

[6]重庆劳动界努力生产、平抑工资宣言[N]. 大公报, 1940-07-13.

[7]李承干. 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M]. 1947.

[8]资源委员会的伟大成就[N]. 中央日报, 1944-02-22.

[9]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806、808.

[10]潘子农. 释“美国作风”[N]. 国民公报, 1941-09-03.

[11]扫荡报, 1939-04-10.

[12]大公报, 1940-04-11.

[13]王安娜.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196.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 252.

[15]老舍. 五四之夜[J]. 七月, 1939, (1).

[16]江泽民同志 2002 年 5 月 23 日视察重庆时的讲话[R].